

“新东北文学”： 来路与去处

本报6月26日刊发《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一文，针对“新东北文学”的发现、阐释过程进行了回顾，并提出对文学“破圈”等的期待，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本期特邀胡哲、梁海两位长期生活在东北的学者，围绕“新东北文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展开进一步讨论。其中，胡哲一文聚焦“新东北文学”与萧军、萧红等经典的东北文学写作之间的传承关系；梁海选择以“后记忆”为视角，考察“新东北文学”的题材意义和艺术特色等。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新东北文学”的质疑和隐忧，如其在打破原有东北“刻板印象”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刻板想象”，个体记忆的写作路径及其局限性等。在多重视野的观察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东北文学”的广阔未来。

——主持人行超

从「单数」走向「复数」

□梁海

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在跷跷板下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写？

在一定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的伊始源自班宇、双雪涛、郑执的东北书写。三位均出生于辽宁沈阳的青年作家，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不约而同地讲述了19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潮那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子一代”的目光投射出苍凉悲伤的底色，加之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所有这些，都为他们的叙事筑起一道清晰的边界，仿佛是在蓄意组建一个“有预谋”的叙事群体。无疑，正是他们的“不约而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学者黄平更是将这个群体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与此同时，新东北文学还呈现出了强烈的“出圈”态势，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有着相当不错的影视改编，而班宇对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魅力。

毫无疑问，新东北文学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深入探讨的文学现象。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新东北文学的实质性“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一文学现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他们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尤其是，近期，几位新东北文学作家似乎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刻意偏离东北轨迹。班宇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中，曾经斑驳锈色的东北故事背景明显淡化，彰显出更多的丰富性，像是“逍遥游”之后的“缓步”前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发出“新东北文学还能走多远”的质疑和慨叹？我想，新东北文学所承载的这些问题域，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毫无疑问，三位作家“子一代”视角的回顾是新东北文学叙事最独特的标识。班宇说，选择过去，是因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相对清楚清晰的感知和认知”。他们在自己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将目光锁定在倒闭的工厂、凌乱的车间、生锈的机器等破败的城市印记中，由此让老工业区的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解读历史。实际上，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在无数记忆的循环中，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在场，让过去的声音在当下喧嘩。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提出了“后记忆”的概念，“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视为创伤性指示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也就是通过隔代记忆的代连接，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创伤体验。从这点来看，新东北文学是下岗工人“子一代”的后记忆书写。

双雪涛的第一部小说《翅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篇有关记忆的文本，其中，名字承担了记忆的“所指”功能。据说，双雪涛在《翅鬼》最初的创作构思中，曾在信纸上随意写着自己想到的词语，诸如峡谷、翅膀、宫殿等，但这些词语并没有唤醒他的灵感，直到“名字”这个词出现，他才一下子找到了叙述的钥匙。《翅鬼》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双雪涛说“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是我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因为它不但使我很快写完了这部六万字的小小说，也使我写出了后来的小说，它是我所写小说的开头”。的确，在文本中，双雪涛反复强调了名字的重要性：

你有了名字，等你死的那天，坟上就能写上一个黑色的“默”字。走过路过的就会都知道，这地方埋着一堆骨头，曾经叫“默”，这骨头就有了生气，一般人不敢动它一动，你要是没有名字，过不了多久你的坟和你的骨头就能被踩成平地了，你想想吧，就因为我没有名字，你的骨头就会被人踩碎粘在脚底，你不为现在的你着想，你也得为你以后的骨头着想。

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曾指出：“记住她的芳名，不如说依赖于人害怕被遗忘而需要记住名字的事实。”可以说，名字的意义便在于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为了不被遗忘，为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最大可能确认自我的意义。文本中的这些文字反复诉说着“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依据，是维系死后尊严的“名片”。记住名字，不是对自身肉体或者灵魂不朽的

企盼，而是对消失和被遗忘的恐惧。可以说，《翅鬼》中开篇以名字“出场”如同为记忆存档，预示了双雪涛的写作之路，那就是，抵抗遗忘，为无名者发声，寻求身份认同，捍卫生命尊严。我认为，“名字”在双雪涛的笔下可以转译为“我们需要记住”，正如《跷跷板》中埋藏在跷跷板下的那具无名工人的尸体，以静默的存在探讨了记住名字的伦理。遗忘与无名在文本中构建起了被话语遮蔽的历史记忆的多重隐喻。

如果说双雪涛是以名字抵抗遗忘，通过记忆重构自我身份，那么，班宇的后记忆书写则将过去牵引到现在，如同美杜莎的目光，将逝去的过往石化为今天的镜像。记忆有着双向度的指向，既指向过去，又通向未来。同时，也聚焦于当下。正是有了映照于过去时代的镜像，才能清晰呈现时代创伤遗留的疮痍。于是，我们看到，班宇笔下的很多人物，仿佛是从老照片中走出，以黑白底色过滤掉了时代缤纷的色彩，呈现出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即“真正同时代的人，是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时代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行关系，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葆有浪漫主义激情，幻想着打造空中道路。空中汽车司机就像开吊车一样，可以把乘客用长长的吊杆拉到任何指定地点。“空中道路，你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显然，这种虚无缥缈、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凭空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荒诞规划，暴露出李承杰无论是工作能力、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与时代之间都存在着无法磨合的龃龉，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悲剧注脚。《肃杀》中的肖树斌下岗失业，即使有做饭的手艺也不愿找份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球赛。对于肖树斌而言，他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身份，唯有足球这种能够引发荣誉感和归属感的大型体育活动，才能让他重新找到心灵慰藉。他将自己黄金时代的记忆，投射到了当下的语境中，以扭曲的幻象排挤残酷的现实，最终让自己沉沦在过去的阴影里，构成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如同《逍遥游》中重病的徐玲玲追求的逍遥游，实际上却是一场最为心力交瘁的旅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是自觉地担负起了书写一个时代的使命。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书写作为“父—辈”的工人阶级，在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光后，为寻求身份认同所经历的困惑、痛苦、彷徨、沦落，乃至不甘、抗争与追求，从而进一步揭示“共和国长子”在时代重大变革中留下的创伤记忆。所以，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在跷跷板下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写？我想，这也是新东北文学引发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然而，从另一个维度看，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记忆的领域充斥着幻想和投射，正如赫希所说，“呈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形象，以及被我们从现在带入过去、以期找到自我问题答案的隐喻和结构，可以成为记忆的屏障，帮助我们投射现在或者永恒的需求与愿望，并为我们阻挡其他形象，其他尚未进入意识的问题”。当单向度的记忆色调弥散开来，在唤醒我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其他应有的色彩。由此，有关父辈记忆的“白日焰火”，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苦难消费，将东北晕染成一块唯有锈色的地带。或许，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危机，他们对东北暂时的疏离感是表达某种“去标签化”的“独立宣言”，同时，也是“缓步”之后的深度思考。我相信，东北依然是他们文学世界的底色，正像班宇所说的，“我毕竟还生活在这片土地，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不但没有‘去东北化’，我反而是在继续书写东北。我把今天的我感受到的东北样貌，身边人的生命困惑，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这是我继续的一个部分”。当然，如何“继续”是作家自由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文学东北应该由单数变为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交汇，填补段落之间的空白，呈现多维度的历史切割面，以及文学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新东北文学”之“新”在指涉美学价值与主题内蕴之外，也说明了新世纪“东北文学”正在生长、壮大与接受“经典化”的过程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新东北文学”实现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叙事”三个纬度的超越与突破，以地方性为中心，致力于全面展现地方特定历史经验与地方性格特质，并蕴含着具有普适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蕴。

“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在学界不断发酵，黄平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为对“新东北作家群”的价值评判，他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继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北作家走向公众之后，“新东北文学”也逐渐走向了“经典化”之路。新东北作家群体的形成实际上是“新东北文学”的发展样态和外化表现，于这一现象之中观察东北文学创作的新经验、新模式、新突破，才能挖掘出“新东北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新东北”的“常”与“变”

所谓“新”必然脱胎于“旧”，“新东北文学”自然产生于“旧”的东北文学传统当中，二者具备着“常”与“变”的内在关联。其中东北的地域文化、东北人民的性格特质，始终是东北文学得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渗透在一代代东北作家的创作当中。自觉接续东北文学的写作传统与文化精神，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其中“东北城市书写”的传统是“新东北文学”的重要创作资源。东北城市文化的形成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东北文学的起步是从乡土走向城市，一路走来，城市都是东北文学创作重要的表现内容。由于战争这一历史原因，外来技术及文化的侵入在无形之中加速了东北的现代化转变。中东铁路的修建刺激了东北城市的兴起，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契机开阜，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发展繁荣起来，东北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群最为明显的地区。在上世纪30年代，萧军、萧红等作家就已经发生了从乡土写作到城市写作的创作转向，其作品中直接描绘中东铁路、火车站、电影院、工厂等城市景观，并从乡土的视角赋予了城市“殖民性”“现代性”以及“批判性”的含义。发展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城市书写更多呈现出大工业景观，如草明的《原动力》、舒群的《这一代人》等作品展现了国家工业建设的肌理与蓝图，具有贴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内涵。新时期以来，东北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由此带来整体的城市焦虑情绪，孙春平、李铁的创作书写了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经历与遭遇。质言之，从城市书写当中反映时代的面貌，始终是东北文学创作的精神所在。东北的城市文化变革与东北城市文学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双向对话的关系。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新的时代体验使“新东北文学”的城市书写发生了改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时代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生活的日益充实，促使了作家自觉于创作之中对人进行“精神寻找”。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老藤的《铜行里》《北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等作品，聚焦城市的过去与当下、历史与传承，努力寻求新时代下人的精神栖居。

从东北作家群创作到“新东北文学”，于城市书写的过程中展现东北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是东北文学的重要表述内容。“新东北文学”之“新”，首先体现在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以悬疑的框架搭建起别样的城市历史叙事空间。双雪涛、班宇、郑执善于以“悬案”作为认识东北特定历史的一个窗口，以“悬案”切入，一方面指涉历史，重新回到90年代经济转型大潮下的历史现场，另一方面指涉人文精神，旨在发现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精神境遇以及人性的多维和复杂。“新东北文学”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其书写历史的伤痕，而是对“伤痕化”的突破。这种有意识的“突围”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东北作家群”会默契地选择运用“子一代”的写作视角，而不是其他的创作视角。“子一代”象征性的绝不是狭隘的、个体化的“伤痛记忆”，而是以东北后辈人的身份回望、清理、和解、向前。新的东北书写中蕴含着东北人和时代之间的奇妙张力，就像双雪涛《飞行家》的结尾，李明奇终于在红旗广场放飞热气球，让普通人的梦想、尊严与热爱在逆境中获得新生。书写历史的阵痛，而又限于缅怀，作家想要传递的是一代代东北人“向前走别回头”的昂扬和“重生”。在“去伤痕化”的过程中，“新东北文学”也实现了对“娱乐化”的突破，打破了外界对于东北的刻板印象。幽默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标签，而这种“幽默”伴随大众文化和新型媒介的传播影响力，外化成了一种较为肤浅的“搞笑娱乐”。在“新东北文学”当中，东北的“幽默”精神被重新启用，内化为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在“新东北文学”当中，“幽默”不只局限于东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精神，在自嘲之外，还具有一种抵抗外界刻板印象的文化价值功能。东北的“幽默”绝不是供他者凝视的娱乐对象，更不是“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醉”，而是通过“自嘲”生发出全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信念，以深沉的“幽默”意蕴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并解构外界对于东北的误解与固有印象。可以说，“新东北文学”不是陷入历史缅怀的悲情叙事，而是以理想、希望、热爱和自信作为精神养料，宣扬对生活和平普通人的爱。

打破东北“刻板印象”与“新的刻板想象”

“回望历史”构成了“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主题。在此之外，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北作家，又为“新东北文学”注入了更多活力。他们的创作延续了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写作资源，将现实的厚重感与人性的纵深感统一于新的东北书写当中，为新时代的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定，以更为广阔的人文视角和现代生命意识填充了“新东北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场感。几位作家都曾提及自己对“母地的眷恋”，他们

以全新、独特的创作技巧给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赵松运用现代主义的技法书写抚顺、伊春这两座东北小城，迥异于以往的“东北写实”，作家通过表现普通人的意识流动，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穿插中追溯工业城市的变迁并探索人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当中的“悬停”状态。赵松笔下的“东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东北”，“东北”不是一个被直接描摹和展现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化为一种气氛和精神潜隐于作品当中，传递出更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东北价值”。在谈波笔下，东北更多以“江湖”的样态出现。他不留恋于对小说情节的铺排，更多的是展现人物间的对话，以市井气的不羁话语塑造东北的社会江湖。“大连彪子们”与“长春彪子们”那句不经意的“跟那两个损色废啥口舌，直接干就完了”，是对东北人豪气、信义的直接展示。从语言的角度全面展示东北，是一个新的创作角度。同时，大量东北俚语、段子地使用使得谈话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东北民俗”价值。在杨知寒的创作当中，她书写的事来源于东北，但不囿于地域。在书写东北记忆的同时，她将现实与梦境相互交织，揭开人间的隔膜与芥蒂，剖析永恒的亲情感与复杂性。作家间创作技巧的异质，使东北书写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并直接促进了新东北文学现场的形成。而在技巧层面的“异质”之外，对生活的体察与对人的关怀始终是不变的内核。总的说来，“新东北文学”正在以一种全新、鲜活的面貌于新世纪中国文坛上焕发光彩。“新东北文学”之“新”在指涉美学价值与主题内蕴之外，也说明了新世纪“东北文学”正在生长、壮大与接受“经典化”的过程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这种不足首先体现在“新东北文学”还缺少“强势”作家的出现，在“铁西三剑客”之外，其他新一代东北作家还未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其次，在“新东北文学”努力打破了外界对东北“搞笑娱乐”的刻板印象之后，“悬疑”“时代创伤”等文学创作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再一次陷入“新的刻板想象”当中，如何处理好地域特色与地域刻板印象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值得作家与批评家持续思考的问题。

“新东北文学”实现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叙事”三个纬度的超越与突破。“新东北文学”以地方性为中心，致力于全面展现地方特定历史经验与地方性格特质，并蕴含着具有普适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蕴。“新东北文学”的意义首先指向地方性，新的美学样式与文化心理丰富了东北文学的谱系，并建构了全新的“东北形象”。“新东北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带动了“新东北文艺”的蓬勃生长，在更为广阔的超越地域的公共文化空间得到了不断地关注与阐释。高质量、深内涵的影视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胆小鬼》《漫长的季节》等都分别来自新东北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指导，可以说“新东北文学”在文学内部和外部均实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实现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繁荣。

将地域作为方法

将“新东北文学”放置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观察，“新东北文学”占据了中国的文学版图，与“新南方写作”相互呼应。两大新文学浪潮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新东北”较之“新南方”具有更清晰的地域边界，更为统一的书写主题和叙事语言。但地方性绝不意味故步自封地自恋自夸，而是要通向更为广阔的中国。从本质来说，“新东北”“新南方”二者的概念是相互融通的，二者共同指涉到崭新的中国书写当中，为整个新世纪中国文坛提供了新经验，激发了新活力。

最后，“新东北文学”为全世界认识东北、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王德威曾强调“文学东学”对“东北学”及“东北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东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东北文学”更应被纳入到一个更宏阔的东北学的研究视域之中。东北自现代以来就受到日本及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这是东北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的方式。新时代全新的东北书写，在主题内涵之中传递出对人类的普遍关怀。“新东北文学”当中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性，潜藏着对爱与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将地域作为方法，立足地方，面向世界与未来，这是“新东北文学”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将地域作为方法，
是新东北文学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胡哲